

## 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研究方法

### 第一節 文獻檢閱：嵌入與去嵌入之論證

以經濟學角度分析台商西進投資，常以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利益理論(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解釋台商投資行為，到中國大陸投資的主要動機在於追求低廉勞力、土地、原料資源等，均為降低生產成本所為。然而在國際投資的例子中，西方跨國公司生產地點的轉移，主要是基於能使產品更適合當地的市場需求，否則隨著當地廠商產品的質量提升後，原有優勢便由當地廠商所吸收，恐面臨當地的消費者可能就會將需求轉向當地廠商的窘境。各企業都知道國際各市場的重要性，知道要打進美國市場、攻入日本市場，當然也要進入新興的中國大陸市場，但是重要的在於知道如何「在地化」，沒有「在地化」的過程，企業也就沒有辦法鑲嵌入當地社會，對於原料、人才、資金甚至市場就沒有辦法發揮最大功效。

然而台商目前多數屬於代工、加工特性，對於當地市場佔有率的提升，還有待加強，故以現階段來說，台商依舊需通過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降低產品生產成本，追求效率利潤(efficiency profits)。因此台商在面對當地廠商的崛起，則需尋求一套壓低成本的方法。而依照當地台商的看法，台商的技術、生產及管理水準與當地廠商差距不大，兩著的差距並不顯著，同時多數台商均表示，研發創新的新產品，便容易被當地廠商所抄襲，台商為保護知識產權，對於當地合作廠商會慎重考量，以防技術外流，且剽竊模仿導致台商無利可圖。

故雙方按理乃應形成協力網絡，由台商扮演輔導角色，相互的商業機密、核心技術亦不必然將輕易外泄。且相對於激烈競爭的廠商，協力廠商通常會更有意願幫助維護核心技術的保存，畢竟此類核心技術所創造的收入，基本上是由雙方

共享。然而實際上，相對他國外商，大上海地區的台商，其技術水平未必全部落後，難謂因此而刻意防範當地廠商。同樣的，相對於台商傳統產業廠商的協力網絡，資訊業等高科技台商（理論上較無懼於生產技術的外流），也並未特別表現出高度融入或與當地廠建構產業網絡的特色，根據筆者的訪談，後者反多傾向聯合協力廠商，同時邁出西進的步伐。

因此若採經濟解釋，會產生兩項問題。首先，經濟學模型的基本預設，在原子式的理性計算，其計算的單位，主要是個別企業的成本效益，但實際商業界的企業決策，往往必須將環境中其他的合作/競爭廠商納入考量，進行整體的成本效益計算。例如就台商有關遷移與否的決定，往往是連同其產業鍊中的協力廠商/網絡一併考量，再作出是否西進的決策。

其次，以理性、自利的經濟行為分析問題時，易忽略社會關係對交易方式的影響。經濟解釋往往停在所發現的各項影響成本效益的因素，例如履約可靠、交貨迅速等原因，但其背後往往有更深刻的社會學原因，例如廠商間的「相互信任」(Andaleeb 1992)。關於此類因素，是更深一層的決定、制約前述經濟解釋所發現的各項因素，對於該因素，我們必須進一步發掘，才能看透企業經營決策或組織形態的根本原則。

此外，台灣企業多屬中小型企業，如把企業當作個體研究，可能會沒有辦法瞭解台商的特質與力量，因此須以企業與企業間的網絡視為分析台商的觀點，則此才能有較完整、真切的陳述。誠如 Granovetter(1985) 所言，所有經濟活動均產生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所以社會關係是經濟行為的核心，台商網絡間的活動便是重點。且台灣企業發展過程中，協力網絡是長期形塑而成，本身帶有發展上的慣性(陳介玄 1994：141-185)，所以從整體網絡觀察台商，會是瞭解上的一個重點。本研究因此著重檢討信任結構、企業聯盟、及協力網絡間的關係，盼能就此提出有關台商組織形態的命題。

台商在同文同種的環境經商情況如何？一向是長久以來討論的焦點。一般而言，台商選擇投資中國大陸的條件中，會把當地語言文化環境列為主要考量的因素，<sup>1</sup>認為台商到當地投資，比較容易融合當地。然而，相對於他國外商，台商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條件，對於台商是否會有比較好的發展條件，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地方。就以收益為例，在同文同種的環境下，最終台商是否能取得最大收益？便有不同的解釋(高長 2000；陳永生 2001；黃智聰、林昇誼、潘俊男 2003)。

目前國內外針對台商的研究，在學界中呈現極為碎裂(fragmented)的情況。主要原因在於台商研究(taishang studies)本身跨越不同學科，分析台商的途徑可能採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不同領域的訓練，因此彼此間關注的角度與範疇不同，尚未具有相互間對話、支援的條件(耿曙、李宗義 2004)。而隨著台商研究的議題漸趨擴大，兩岸政治、兩岸經貿等宏觀面研究，已不能完整鳥瞰台商的實貌，需進而開始重視以台商為主體，從台商與在地環境的互動(吳介民 1996；鄧建邦 2001；博蘭芝、潘毅 2003；王緝慈、羅家德、童昕 2003；耿曙、陳振偉 2005)、台商產業網絡的移植與重構(鄭陸霖 1999；張家銘、吳翰有 2001；張家銘 2001)、到台商自身的背景與特徵(耿曙 2002；耿曙、林琮盛 2005)等問題逐步展開研究。

而台商與中國大陸當地廠家的合作關係，一向是台灣學界研究的重點。邢幼

<sup>1</sup> 在台商投資初期，有研究比較大型企業跟中小型企業投資中國大陸考量上的差異(Hsiao & So 1996)。中小型企業投資大陸的原因，除了生產成本低外，相同的人文社會背景也是重要的考量。

大型企業	比率	中小型企業	比率
1.市場潛力	41%	1.便宜且豐富的人力資源	93%
2.生產成本低	27%	<b>2.同文同種便於溝通</b>	<b>75%</b>
3.易於找到勞工	25%	3.土地、廠房成本低	63%
4.台灣缺乏競爭力	22%	4.廣大市場	43%
5.擔心競爭者搶先投資中國	7%	5.可將舊型機器重新利用	31%
		6.便宜又豐富的原物料	31%
		7.關稅優惠	31%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1991年5月。全國工業總會，1991年8月。轉引自 Hsiao & So (1996)。

田(1998)首先從文化上，研究台商製鞋產業在中國大陸廣東、福建兩地投資的情況，討論台灣幹部與大陸員工的互動，發現同為華人的台商與當地官員間因具有在文化與語言的鄰近性與共同性，如使用同一語言、擁有「關係」(*guanxi*)、「送禮」的文化，有利於讓台商解決產業移植時所產生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進而出現當地化的情況。換句話說，台商產生「嵌入」(embedded)在地制度的情況。而相反的，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台商與當地其實是「去嵌入」(de-embeddedness)的情況。

吳介民(1996)從政治學的角度切入台商跨界投資的情況，提出台商與當地廠商是個「同床異夢」的現象。吳文認為台商身處尚未對產權有一套完整保護制度的中國大陸，為了面對地方上「官僚化的庇護關係」(bureaucratic patronage)和「制度性的尋租行為」(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等結構因素，只好與當地企業合作，發展「關係政治學」以找出生存之道(吳介民 2000)，於是便透過當地企業與地方政府協調，尋求降低台商的「交易成本」，然而當成本一提高，就如吳文中所舉的台陽案例，棄「西珠」換「納福」，台商會去尋找新的當地合作對象。換言之，就是台商與當地企業與幹部各有自己的打算，奔向最利己的道路。

吳文提供從地方環境結構探討當地化的方向，台商基於利益考量只能受結構所牽制。然而隨著台商日益增加與群聚現象，台商自主力量開始增加，台商與地方上的談判籌碼已經有所改變(博蘭芝、潘毅 2003；耿曙、陳振偉 2005)，因此台商是否依然需受地方結構影響？可能要反從台商的自己的位置與權力，重新判斷與決定。

鄭陸霖(1999)與楊友仁、夏鑄九(2004)就從台商自身提出背後運行肌理，認為要從全球商品生產過程的組織場域來看，核心理論就是 Gary Gereffey(1994)的「全球商品鍊(global commodity chains)」。全球商品鍊理論主要研究目的在於解釋全球性產業在控制與協調方面的機制，認為全球生產網絡在相互依賴下，交織著權

力關係的運作。而在全球分工體系中屬於「半邊陲」(semi-periphery)<sup>2</sup>的台商，包含其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行為，都會受其權力的影響。

鄭文分析全球鞋類市場，得知台商在市場中具有「半邊陲」性格的角色，隨著鞋業台商在中國大陸南方形成產業群聚後，形成一個「交易內閉於台商之間的出口導向經濟區」(export-oriented Taiwanese enclave economy)，而這經濟區內的核心經濟行為，沒有辦法嵌入於當地社會(鄭陸霖 1999:11)。楊友仁與夏鑄九(2004)則研究資訊電子業台商在地聚集下的交易關係與組織網絡。他們發現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台商跨界投資深受外商大廠驅動，在跨界生產的脈絡中交織著企業組織間的權利運作。同時北台與蘇南的分工功能完備，且在台商對本地資源策略上的整合與運用，與當地生產網絡互動有限，產生「當地化」速度開始減緩的情況。

然而全球商品鍊理論並不是將中心放在生產網絡或地方制度上，其理論傾向討論「全球化」的部分，對於「在地化」缺乏分析能力，因此無法了解台商是否當地化的真實運作情況(徐進鈺、鄭陸霖 2001)，亦沒有辦法解釋對於在不同地區的企業，怎麼維持與全球商品鍊的聯繫(Leung 2002)。如 Saxenian & Hsu(2001)在研究矽谷與新竹的關連時，提出不同於全球商品鍊將中心放在廠商的行為上，而應該是放在社群關係中，分析所處的社會結構，才可以看出技術轉移的活動。

相對的，張家銘、吳翰有(2000a; 2000b)透過明碁(BenQ)的例子，瞭解台商另外一種「母雞帶小雞」的集體外移型態，並發現其生產網絡的重構與地理空間重新分佈，且藉由昆山同心電鍍廠的個案(張家銘、吳翰有 2002)，瞭解當地廠商如何透過社會網絡與經濟網絡的加強，成功地與台商建立協力網絡。這都可以說是修正鄭陸霖(1999)對台商「假 OEM、真 FDI」的假設，補充說明研究台商除

---

<sup>2</sup> 在世界體系理論的「核心-邊陲」的概念中，核心指的是主宰大部分利潤的經濟，而邊陲則是僅支配少量或是沒有任何利益的經濟行為。而「半邊陲」是介於這兩者間的中間關係，通常是指有「邊陲」爬升上來的國家。回到台灣來說，即便台商大量從台灣移到國外投資，或者是其他地區後勢驚人，台商通常還是擁有重組生產網絡的能力，或是與國外廠商的鑲嵌，達到維持半邊陲的地位(龔宜君、吳鯤魯 2003)。

其全球商品鏈的「半邊陲」性格外，在地條件、宗主國文化的影響(Hofstede 1980；李新春 2000：248-260)亦是在研究上不可忽視的一環。

綜合上述，針對台商是否會嵌入當地的論證，各有不同的觀察問題與研究途徑；且隨著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進程，受到台商所關注問題的轉變，研究的問題自然也有所差異。

## 第二節 相關文獻：產業群聚

經濟全球化興起與通訊技術發達使得經濟活動可以輕易的跨出國界，讓人才、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國際間輕易且頻繁流動，並且形成全球生產網絡。全球化固然已經成為「跨世記的顯學」(洪朝輝 2000)，然如懷疑論者(the skeptical thesis)獨排眾議認為全球化可能只是一種「迷思」(myth)，所謂國際貿易、資本流動和生產分工的轉變，只是對全球化的幻想，<sup>3</sup> 即便是最受矚目的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亦非得以成為「全球行動者」(global agent)。

另外，多國籍企業的民族性(nationality, Pauly & Reich 1999) 和本國政府的介入、人際網絡的影響(Veseth 1998)等，這些結構依然會對全球化大打折扣。因此我們觀察經濟全球化的運作時，不可能脫離實際的生活實踐與生活史(Kalb 2000)。故就經濟活動的空間而言，全球化與在地化並不互斥，一些經濟地理學、經濟社會學、管理學等學者開始提出折衷的論點，分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從全球看在地(the global goes the local)，和「在地全球化」(lobalization)-從在地看全球(the local goes the global)不同角度之論點(徐進鈺、鄭陸霖 2001)。全球化的力量，還是必須依靠地方來實現，並且隨著在地條件(local conditions)的不

---

<sup>3</sup> Hirst 和 Thompson 在其懷疑論論者的代表作品中寫到，那些現象其實在歷史上都曾出現過，如今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呈現，並沒有以「全球經濟」所取代(Hirst 1996：18-50)。

同，產生不同的效果(張家銘、徐偉傑 1999)。而在這樣的背景下，產業群聚(industrial cluster)成為全球與在地的拉鋸戰中，最具有全球與在地的特徵，日漸受到重視。

產業群聚的特色與效應引起了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界的關注，畢竟經濟全球化下的企業，儘管提高了全球產業分佈的格局與速度，但是為了加強與更新企業組織的能力，必須要關注在當地產業群聚的現象與環境。Porter(1996)在其《國家競爭優勢》大作中認為競爭優勢的持續，主要靠的是資源的擴大與升級，而 Porter 一直強調能夠具有這樣的條件，產業群聚是個必要條件。

產業群聚是指地方企業群聚，是一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聯繫之公司和相關連的機關，它們同處在一個特定的產業領域，彼此因為具有共同性和互補性而聯繫在一起(Porter 1998)。如 Ann Markusen(1996)所形容：「在平滑空間上的黏滯地帶」(sticky places in slippery space)，有些地點就是能夠吸引生產活動在那裡聚集。對於產業群聚的研究很早就有學者注意到這個現象，認為市場會自然向某一空間聚集的趨向。

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 在其名著《國富論》中就已經開始提到分工與市場範圍的關係，且這些行業的發展與產業聚集之形成不無關係。而正式描述產業集群理論的經濟學家 Alfred Marshall 在其一個世紀前出版的《經濟學理論》一書中，就提到「外部經濟」(economic externality)、「規模經濟」(scale economy)的重要性，認為透過專門人才、機器、原料提供、運輸便利與技術擴散等所造成的「外部經濟」會進而形成企業的地理聚集與技術擴散的情況。

Marshall 的研究到八十年代，衍生出一系列有關新工業區(new industrial district, NID)的研究。提出某些地區產業群聚的成功，是有其原因可解釋：首先為生產技術的提升，帶動生產過程的專業化與彈性化，擁有彈性專精(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優點；其次外部經濟的產生，使群聚間的企業協力程度提高，補充中小公司的不足。最後隨著外部經濟與公司間的「共同行動」，讓群聚內的合作與行動可以獲得額外的好處，形成「集體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Schmitz 1999)。

近代學界各領域對於產業群聚的現象更加關注，並且發表更多不同面向的成果。Krugman(2000)試圖以主流經濟學模式研究產業群聚，認為其產業群聚最初產生原因是在於歷史的偶然性，而報酬遞增的效應則建立在生產要素的差異與空間流動的基礎上。Krugman(1991)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供給需求上空間性的影響，指出產業聚集可以具有為勞動力市場提供特定產業技能、生產專業化產品、資訊溢出等好處。Porter(1998)則從企業競爭優勢的角度上，認為透過產業集群可以使得在一個地區內業務上互相聯繫的廠商，包含提供零組件的上游、行銷與服務客戶的下游、提供互補產品的製造商，以及具有相關技能技術的其他行業的廠商等，可以形成競爭力和發揮競爭優勢，以求能在市場經濟中對於生存和發展可以有基本保障。因此產業群聚的優勢乃為學界一直討論與肯定的特點。

整體而言，產業聚集的現象對企業提供了許多優點（參閱表 2-1），最常見的如經濟外部性及技術外溢(spill-over)、內部成員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帶來公共性投入或生產要素的互補互享，或者發展成為具有創新與技術學習的產業聚集 (Saxsanne 1999；徐進鈺 1999；魏江 2003)等。而這樣的特徵帶給在該地形成產業聚集的成員，能夠因為地理上的鄰近，而對訊息的掌握與運用，會因之間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網絡，達到分享的效能。因此一但產業聚集形成一定規模後，對於後進者來說選擇同一地點會對生產績效有幫助。

除了從經濟觀點觀察產業群聚外，近來學界也開始關注產業群聚內的社會經濟學。許多績效優良的企業群體，網絡佔有極大的貢獻。在產業群聚內網絡內的行為者透過長期的互動與交往，建立人際關係間的信任與產業網絡以簡化交易活



表 2-1 產業群聚的優勢

經濟規模	群體的集體效率形成外部規模經濟；專業化分工與協作取得外部範圍經濟。
投資活動	區內優質產業優化組合，可以容易獲得融資機會；擁有建立共同信貸擔保基金、本地金融機構服務等的間接融資機會。
技術人員供給	通過外部經濟，形成本地充足供給的勞動力市場
技術擴散與創新	企業、中介與研究機構形成網絡式、互動式創新；隱含性經驗和技能容易在當地傳播；因為競爭與合作關係密切，技術在群內的擴散速度很快，易獲得溢出效應。
管理方式	依靠低交易成本，形成介於市場與組織的網絡組織，管理效率最高。

資料來源：王緝慈(2001：20)。

動，並逐步形成保障此種關係的社會機制，能有助於社會資本的積累並降低交易成本(Granovetter 1985)。

因此，我們必須瞭解群聚間成員之間的關係為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關係？以及整體社會資本、民間交流的情況為何？才能說明如何透過地理位置的鄰近性與非正式的本地連結，以加強台商網絡間的信任結構與協力網絡。

###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主要在於關注台商產業網絡當地化的情形，而如上章透過背景介紹發現台商與當地廠業間有「合資縮減」、「協作落後」的情形，此表示台商與當地未出現一般認為會大量當地化、鑲嵌的現象。這樣的情況與外資相比更顯特殊。故本研究假設為：

台商在產業群聚、協力網絡與信任結構三者的交互運作下，減緩其產業網絡當地化的廣度與深度。

因此本研究提出自變項為「產業群聚」，依變項為「產業網絡當地化」，探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本研究將從企業網絡間的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觀察，其關鍵在於產業群聚的效果將加深除了原有的產業網絡移植外，還有信任結構的維持與增強，形成相互影響的關係，請參考圖 2-1 的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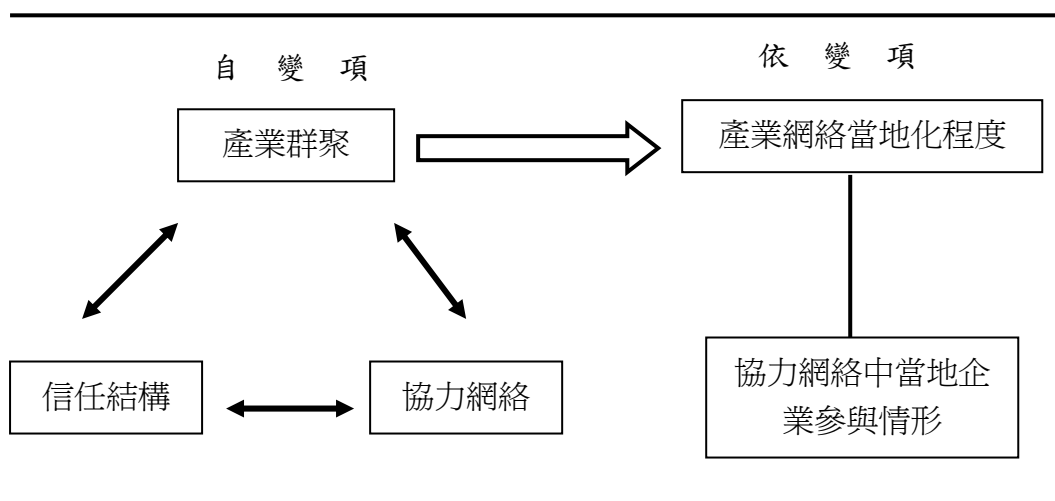


圖 2-1 研究架構圖

## 二、研究方法選擇與限制

本研究所探求的主題，如要真正了解內在涵義，光依靠資料收集恐無法獲知全貌，因此採取質性的研究方法，透過在大陸的田野調查，對當地台商做訪問，貼近被研究者的環境，相信將會讓本研究的成果更貼近事實與原貌。

###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前往被研究者所處地區做田野調查。首先，主要透過訪談的方式進行質性資料的收集，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研究法，由筆者依訪談問卷擬定之題目逐項提請受訪者回答，而為使回答答案可以與研究主題更具深入性，同時輔以「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 研究法，讓田野資料可以更加完善。其次，在田野現場採取觀察的方式，可以直接面對與聽到被訪問者的行為與反應，也可以對當地環境及場合擁有更具體的意象。

之所以選擇上述研究方法，有兩點因素：首先對於台商當地化的議題，一般如果僅依統計資料、二手文獻，可能無法深入探討台商的實貌，況且本研究的研究主題屬於社會層面研究，分析單位以公司為主體，來尋找出公司對外的組織網絡關係，從而推論出整體網絡的運作型態，因此採取質性研究法才得以一窺全貌。

再者，修課期間受指導教授啟發，對質性研究深感興趣，認為質性研究應是進入田野必備的基本技能，也是初入田野的學習者應該熟習與操作的研究方法。筆者指導教授對於質性研究相當熟稔，除博士論文外，近年的國科會計劃亦採質化研究，故在指導教授教導下，筆者相信能迅速掌握質化研究法的訣竅，順利運用於本論文質性資料的收集。

研究程序上，筆者先於 2004 年 8 月 3 至 10 日，隨指導教授前往上海地區做為期八天的前置研究。而後筆者在中華發展基金會的補助下，再次於 2005 年元

月 13 日起前往上海地區蹲點，至 3 月 31 日結束田野工作，返回台灣進行田野資料整理與論文寫作工作。在操作程序上，進田野前會先整理台商到大陸產業網絡運作、產業群聚分布的背景，以求易於與受訪者對話。尋找受訪者方面，在出發前先運用個人資源尋找符合產業設定的台商，但是因資源有限不容易找到合適的受訪者，於是在進入田野後，開始透過滾雪球方式一一聯繫，尋求符合條件且願意接受面訪的台商，最後本研究獲得十六次受訪機會。

每次面訪時間都有 40 分鐘到 90 分鐘不等，一般平均都有 60 分鐘以上。訪談內容雖有擬定大綱，但常會依現場情況與話題，而有相對應的調整與彈性。大綱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瞭解受訪者投資歷程，其次詢問生產網絡移植過程與協力關係的動態發展，最後訪問在群聚中台商社會網絡之運作(參閱 附錄)。在訪談的過程中與台籍受訪者多以台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而筆者感受到同為台灣人的身份，對受訪者在受訪的情境上有一定程度的鼓勵作用。不同於台籍受訪者，當筆者詢問可否錄音時，中國大陸籍受訪者往往表現出拒絕的態度，而只能改用筆記。最後本研究完成十三份台籍受訪者，得以錄音製作完整逐字稿，與一份中國大陸籍受訪者的筆記。

除了質性資料收集外，筆者亦在田野過程中，尋求當地的廠商、組織成員或其他相關政府、學術機關等提供相關的數據資料，以求研究的準確與完整。並且在田野工作過程中，於訪談、搜尋資料之時，同步進行分析研究。藉由不斷進行歸納、整理、分析剛收集的資料，不斷調整值得深入的問題與方向，在研究情境上一一直保持彈性，以求找出解答問題的核心答案。

## (二) 研究地點與對象

調查選點方面，本研究將以中國大陸上海市與江蘇省南部一帶為主，之所以選擇該「調查點」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過去台商因為開放時間、程度與交通等因素使台商多群聚於廣東、福建兩地，不過隨著中國大陸開放程度提昇，加上

宏觀政策的推行，如「沿長江經濟發展戰略」(高長 2001：143)，台商投資地域開始北移，使得華東成為台商投資的熱門地區。其二，依經濟部投審會統計資料來看，亦可知台商在長江三角洲投資情況相當踴躍，長江三角洲已具有台商產業群聚的現象，因此以長江三角洲的台商作為研究地點極具台商代表性。故本研究將以上海市和江蘇省南部為主的長江三角洲地帶為研究地區。

訪談對象方面，筆者一開始以強連帶關係選擇被研究者，再以滾雪球的方式與其他個案的受訪者取得聯繫，同時開始進入研究現場。不過礙於面對個案選擇的問題與限制，本研究的受訪者乃為台商及其他相關友人相互介紹，雖經筆者剔除、挑選適宜的被研究者，但還是有可能導致「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對此筆者認為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商置於產業群聚下的變化，重視其「啟發」處(heuristic)，專注於少數的個案，故應不致影響研究效度(validity)。

進入田野後，則鎖定任職於具有產業群聚產業的受訪者，所找尋到第一批產業是屬於運輸工具製造業中的自行車產業。自行車業自 1992 年到 1997 年開始在長江三角洲投資並且形成群聚現象，其以上海市附近的太倉市、昆山市為核心，主要廠商散佈在在上海、蘇南的範圍內，著名廠商如捷安特 (Giant)、巨鳳，以及在太倉市陸渡鎮<sup>4</sup> 等台灣自行車廠家(參閱 圖 2-2)。因此，便首先以具有產業群聚現象的自行車業作為觀察對象。

此外，台商在長江三角洲中以電子及電器產品製造業投資比例最高，且台灣電子業多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大陸，如：筆記型電腦、監視器、主機板、電源供應器、機殼、掃描器、鍵盤、滑鼠等產品。其中筆記型電腦產業生產網絡相當完整，主要於 2000 年開始大量進入中國大陸，並帶進相關的協力配套廠。筆記型電腦生產的公司，幾乎集中在上海、蘇南的範圍內，形成產業群聚的現象。諸如廣達(Quanta)、英業達(Inventec)設於上海市，而仁寶(Compal)、緯創資通

---

<sup>4</sup> 具受訪者表示，在陸渡鎮橫貫的太瀏公路旁，便聚集了近七十家自行車台商，形成名符其實的「自行車一條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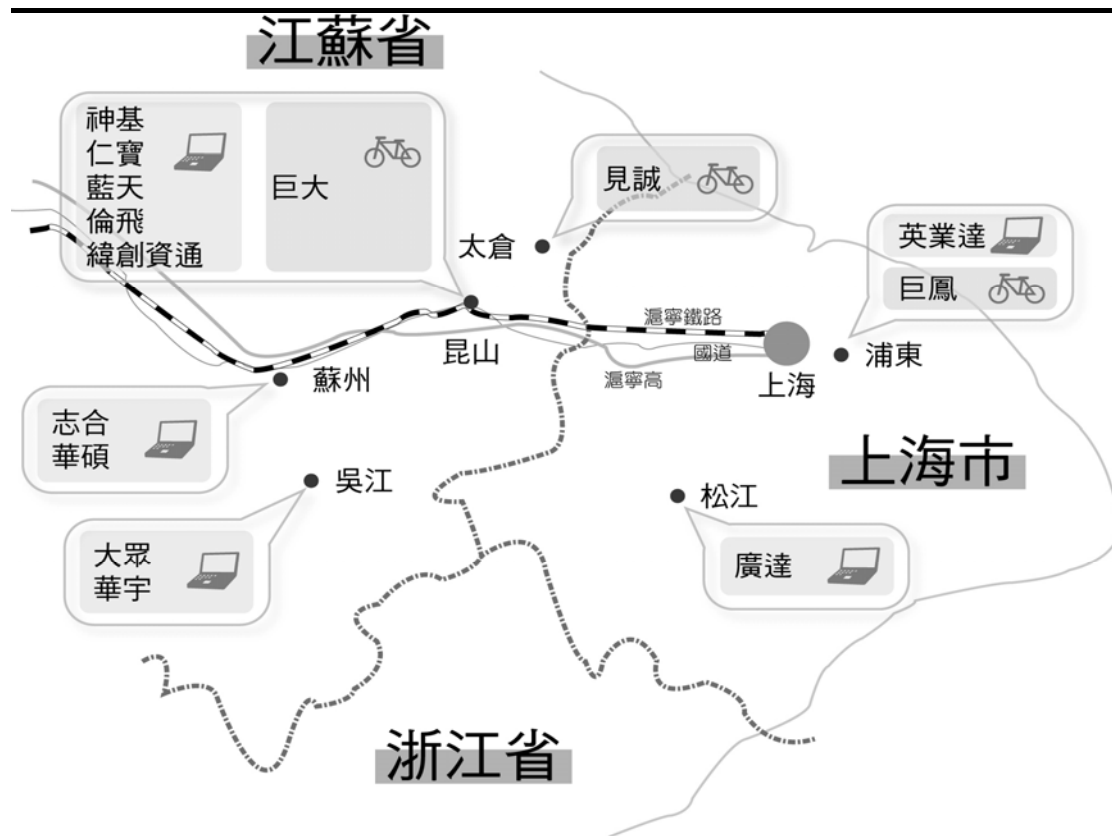


圖 2-2 台資筆記型電腦組裝廠與自行車組裝廠地理位置圖

(Wistron)、倫飛(Twinhead) 位於昆山市內，志合(Uniwill)、藍天(Clevo)等處於蘇州市內，華宇(Arima)與大眾(LEO)則集中在吳江市中，這些地理位置均相當接近(亦參閱圖 2-2)。故為分析高科技業在產業群聚的表現上，是否與傳統產業有何差異，進而開始尋找筆記型電腦產業內的受訪者。

整體而言，經由受訪對象的幫助與介紹，最後得以分出兩組可供參考、對比的研究對象，一組是代表傳統產業的自行車產業，另一組是代表高科技業的筆記型電腦產業，該兩產業均有很強的網絡特性，及明顯的產業群聚，因此具有一定的效度。最後將受訪者條列於下(參閱表 2-2)，然礙於與受訪者保密協定，便以代號稱之，此後文中出現受訪者的訪談時，逕以代號表示。

表 2-2 訪談對象表

受訪人產業別	公司屬性	受訪人 (代號/職位)	受訪人身份	受訪地點	受訪日期
自行車產業	配套廠	A 副理	台資台幹	浙江平湖	2005 年 1 月 21 日
資訊軟體產業		B 顧問	外資台幹	上海盧灣	2005 年 1 月 29 日
化學品製造業	組裝廠	C 副總	台資台幹	上海青浦	2005 年 2 月 1 日
筆記型電腦產業	組裝廠	D 副理	台資台幹	上海浦東	2005 年 2 月 2 日
筆記型電腦產業	組裝廠	E 經理	台資台幹	上海松江	2005 年 2 月 18 日
自行車產業	配套廠	F 廠長	台資台幹	蘇州昆山	2005 年 2 月 21 日
精密器械製造業		G 總	台資台幹	上海徐匯	2005 年 2 月 28 日
精密器械製造業		H 總	台資台幹	上海長寧	2005 年 3 月 3 日
自行車產業	組裝廠	I 經理	台資台幹	蘇州昆山	2005 年 3 月 10 日
自行車產業	組裝廠	J 總	台資台幹	上海徐匯	2005 年 3 月 14 日
自行車產業	組裝廠	K 副總	台資台幹	蘇州太倉	2005 年 3 月 19 日
筆記型電腦產業	組裝廠	L 部長	台資台幹	蘇州昆山	2005 年 3 月 22 日
筆記型電腦產業	組裝廠	M 襄理	台資台幹	蘇州昆山	2005 年 3 月 24 日

自行車產業	組裝廠	N 採購	台資陸幹	上海青浦	2005 年 1 月 17 日
-------	-----	------	------	------	-----------------

